

周作人的“东亚文明”意识

——以武者小路实笃、柳宗悦对周作人的影响以及他对韩国文化的认识为主

洪昔杓 著
崔丽红 译

论文摘要：1919 年前后周作人对日本“新村运动”及以武者小路实笃为代表的日本“白桦派”知识分子的理念产生共鸣而向往人类主义或世界主义，加上韩国 3·1 独立运动的冲击和对韩国空间实体的亲身体验，使他开始学习韩国语并购买有关韩国文化的书籍。尤其是 1924 年、1925 年左右，他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从文学转向文化思想之后，加快了对歌谣、神话和传说、民间故事、风俗的研究步伐。柳宗悦的《朝鲜与其艺术》为周作人了解韩国的文化和艺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周作人高度评价韩国的文化地位和艺术价值，为了论证韩国的文化自我认同，他翻译了“朝鲜传说”，认为朝鲜民族具有固有的文化自我认同，他大力支持朝鲜民族实现国家独立，并从比较学角度提出中国的文化研究有必要研究“朝鲜学”。他认为，应该避开当前的政治关系，从东亚文明角度出发，先来探索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中、日、韩东亚三国的文化关系。他还构想在此基础上建立能够实现东亚各民族国家独立的新的政治关系。但是，周作人对韩国文化的认识和他的东亚文明意识仅止于宣言性的理念，缺乏具体性和实践性，这在他后来的行动中得到了证实。他试图努力摆脱现实政治，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受到日本侵略“政治”的拉拢而陷入了“亲日附逆”的泥坑。周作人从柳宗悦和武者小路实笃那里都曾受到过一定的思想影响，但他没有跟随柳宗悦参与现实运动以抗

拒日本军国主义，而是追随武者小路实笃走上了鼓吹“大东亚主义”的道路。周作人曾在柳宗悦的影响下积极主动地了解韩国的文化和艺术，并在这一过程中，积极提倡研究东亚文明，然而它却未能把这一研究引向“思想”的深度，结果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主义”引诱和拉拢，走上了为日帝摇旗呐喊、“亲日附逆”的歧途。

关键词：周作人，武者小路实笃，柳宗悦，韩国的文化和艺术，东亚文明意识，“思想”的局限性，大东亚主义

1. 同韩国人交流，购买有关韩国文化的书籍

众所周知，周作人曾在中国“文学革命”时期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评论文章，阐释了中国新文学的理念。他还作为散文家，为中国现代散文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体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又作为北京大学教授，对欧洲文学和日本文化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也翻译出版了许多作品，因此而享有盛誉。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之间，他曾同韩国的文人及其他知识分子频繁交流，密切关注“朝鲜”和“朝鲜文学”。20年代初，创建北京世界语学会时，他同韩国著名诗人吴相淳有过交流，当时吴相淳以《亚细亚最后的夜景》、《亚细亚之黎明》等作品闻名。此外，周作人还经常与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并参与创建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的无政府主义者、独立运动家李又观有频繁的接触。1931年，周作人接待了来访的韩国学者金台俊和丁来东，并同他们分别进行了交谈。当时，毕业于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的金台俊正忙于著述《朝鲜小说史》和《朝鲜汉文学史》，而丁来东则于中国民国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大学听课同时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当时周作人向金台俊询问有关朝鲜文学、歌谣、文坛形势等方面的问题，¹还向丁来东表示“很想了解有关朝鲜文学的问题”。² 1942年以首尔《每日新报》特派

1 短舌（金台俊），《与鲁迅（周树人）的弟弟周作人会面》，（载《北平纪行：傻瓜游燕草》），载《新兴》6号（1932.1），第60页。

员身份住在北京的文学批评家白铁访问了他。当时周作人在尽量回避与外部人士接触，却接待了白铁。他说：“既然说不是以报社记者的身份，而是以朝鲜文学家的身份要求见我，刚好我也很了解有关朝鲜文学的情况，所以，我答应了你的面谈要求。”³他还说：“想了解朝鲜的新文学运动”“想读最近的朝鲜文学作品”，对“朝鲜”新文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⁴

周作人习惯在日记中⁵记录自己购买或收到的各类书籍的书名，其中有不少同韩国文化有关。如，

1920年7月：前间恭作的《韩语通》⁶

1920年10月：三轮环的《传说的朝鲜（傳説の朝鮮）》⁷

1922年12月：柳宗悦的《朝鲜与其艺术（朝鮮と其藝術）》（1922）⁸

1925年3月6日：山内正诚的《朝鲜语研究》⁹

1929年6月22日：浅川巧的《朝鲜的膳（朝鮮の膳）》（1929）¹⁰

1929年11月16日：柳宗悦的《杂器之美（雜器の美）》¹¹

1933年3月20日：陶器图录《李朝白瓷》、《李朝铁砂》¹²

1933年11月6日：改造文库的《朝鲜民谣选》¹³

2 丁来东，《中国文人印象记（4）：精密、坚忍、谦让、始终如一的周作人氏》，发表在《东亚日报》1935.5.4。

3 白铁，《北京夏天的夜话》，载《世代》第1卷11号（1973.11），第362页。

4 白铁，《北京夏天的夜话》，载《世代》第1卷11号（1973.11），第362页。

5 周作人的日记现在在中国有影印的手写本《周作人日记》（上·中·下）（大象出版社，1996年），影印的是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的一本手写本。《周作人日记》只收集了1898年到1934年期间的日记，其中，1906年到1911年间的日记，1928年和1931年的日记有遗漏。

6 《周作人日记（中）》（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177页。

7 参见《周作人日记（中）》，第180页。

8 参见《周作人日记（中）》，第285页，周作人在日记中记录为《朝鲜与其艺术》。

9 参见《周作人日记（中）》，第432页。周作人1930年9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取建功还朝鲜语书二册”（《周作人日记（下）》，第119页），因魏建功的专业是中国语言学，“朝鲜语书二册”估计是《韩语通》和《朝鲜语研究》这两本书。

10 参见《周作人日记（中）》，第658页。

11 参见《周作人日记（中）》，第735页。

12 参见《周作人日记（下）》，第399页。

13 参见《周作人日记（下）》，第516页。

1933年11月28日：岩波文库的《朝鲜童谣选》¹⁴

1920年自从周作人购买了有关韩国语和朝鲜传说的书籍后，直到30年代初一直没有中断过，并将购买范围扩大到朝鲜艺术、朝鲜民谣和朝鲜童谣等方面。在这一期间他还翻译了朝鲜民间传说，于1925年以《朝鲜传说》为题发表在《语丝》杂志上；1926年他写了《李完用与朴烈》一文，发表在《京报副刊》（2月26日）上，纪念烈士朴烈并赞扬他的“血气和勇气”；1931年应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之邀，写了《朝鲜民间故事》一书的序文。周作人通过这些文章强调韩国文化的独立性，赞美韩国艺术并积极支持韩国的独立运动。1950年韩国战争爆发，那年8、9月间周作人在上海发行的《亦报》上连续发表《朝鲜文字》、《朝鲜陶器》、《朝鲜雕刻》等一系列短文，介绍了韩国文字的优秀性和韩国艺术的优美性。

那么，周作人为什么会与韩国人频繁地进行交流，并积极购买有关韩国文化的书籍，还强调韩国文化的独立性呢？又为什么会大力支持韩国的独立运动并赞美韩国的艺术呢？要找出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需要先了解在他脑海里形成东亚文明意识的全过程。至今还没人具体研究过周作人的“东亚文明”意识。¹⁵这也许是因为1937年以后他开始极力宣传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主义”，走上了“亲日附逆”之路的缘故吧。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他关注韩国文化是以东亚文明为出发点，这与他走上“亲日附逆”路线之前所进行的学术活动及其思想立场有密切的关联。本文将详细探讨周作人为何能够从东亚文明观点出发来关注韩国文化，将考察其整个过程和思想背景，探讨他对韩国文化艺术和对中、日、韩东亚三国文化关系的看法及立场。还将论证他的东亚文明意识是受到日本白桦派知识分子，如武者小路实笃和柳宗悦等人的影响而形成的。另外，本文还将探讨他“思

14 参见《周作人日记（下）》，第527页。

15 吴敏曾分析《李完用与朴烈》一文说，当时周作人对韩国人的认识，与当时中国的“集体想象物”全然不同，他描绘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他者”形象。吴敏说：“周作人和台静农一样，都在自己的作品中不屈不挠、浴血抗争的朝鲜民族表达了由衷的敬意，描绘了与“集体想象物”迥异的“他者”形象。”吴敏，《台静农、周作人笔下的韩人形象》，发表在《当代韩国》2008年夏季号，第99页。

想”上的局限性。

2. 学习韩国语和认识“朝鲜”的起点

1920年7月周作人购买了《韩语通》一书。该书是1909年5月由东京丸善株式会社出版的学习韩国语的教材，该书介绍了韩国语的发音、词汇、语法等，还附有会话例文。¹⁶那么，周作人为什么要购买这本书呢？这可以在同年10月20日他寄给长岛丰太郎的回信中找到答案。长岛丰太郎曾给周作人寄过日本“新村”运动的机关杂志《新村》（《新しき村》），这封信是给长岛丰太郎的回信。他在信中说：

我正在学习世界语。书能稍稍读一些，但尚不能用世界语写作。我还想学习朝鲜语，但没有合适的教材，而且朝鲜语发音很难，所以没有什么进步。如果能懂一点朝鲜语，明年或者什么时候去日本，顺便也想去朝鲜看一看。现在我对朝鲜的事情一无所知，但不知为什么对朝鲜怀着一种爱，想了解朝鲜人的精神世界。¹⁷

回信中说明自己处在政局混乱的中国，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无法对“新村”做出任何贡献，然后，他说自己正在学习世界语，还想学习韩国语。由此可知，周作人要学习世界语和韩国语同日本的“新村”运动理念有某种关联。给长岛丰太郎发出回信的三个月之前，他购买了《韩语通》，大概是用来学习韩国语的。¹⁸

16 该书第一篇为“声音”，以发音为主，用罗马字标音，说明了字母及拼写方法。第2篇为“语词”，说明了名词、数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感叹词、动词、助词（即，弓尔乎波）、助动词（即，词尾）。第3篇为“会话例”，将例文分为15种类型，加了日语对译。参见，前间恭作《韩语通》（丸善株式会社，1909年）。

17 董炳月译，《周作人致长岛丰太郎》（《新しき村》1920.12），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2期，第160页。

他在《外国语》一文中明确表示自己的“杂学”大多是以英文和日文为媒介形成的，还说，除了英文和日文之外，他还学过古希腊文和世界语。¹⁹他说：“世界语的理想是很好的，至于能否实现则未可知，反正事情之成败与理想好坏是不一定有什么关系的。”²⁰他还说，学习世界语时，他是靠用英文解释的世界语书学习一两年之后，到第三年干脆下大决心一下子学完了全书50课，之后，就达到了利用词典可以看书的程度。²¹看来，周作人给长岛丰太郎寄回信的时候，正是他刚刚可以读世界语书的时候，他虽然说“要学朝鲜语没有适当的教材”，其实，他那时已经用《韩语通》开始学习朝鲜语了。1921年1月初周作人身患重病，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那时他连续5个月连日记都没能写。²²因此，继续学习世界语和韩国语的计划只能落空了。尤其是第二年，即1922年2月起，俄国的盲人诗人爱罗先珂来八道湾11号周家居住，在同年3月起在北京大学开设世界语讲座，并由周作人负责，同年5月23日北京世界语学会成立，由他担任学会会长。在这番忙碌中，周作人可能就中断了韩国语学习。之前周作人学会了英语、日语、希腊语和世界语，但学习韩国语却以失败告终。然而他没有中断购买韩国文化书籍，还继续与韩国人频繁交流。从1929年下学期开始，他任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系的系主任。在这期间，他聘请了韩国人金九经任讲师，由此北京大学首次开设了“朝鲜语”讲座。²³恐怕这也同他学习韩国语的经历有关。

18 据《日政下发禁图书目录》记载，1936年12月8日出版的咸南德原·洪泰华（德国人）著《朝鲜语入门》一书，以治安问题为由，于1936年12月10日被定为禁止出版发行的书。而1932年5月在大阪出版的《三月卒业，日鲜语新会话》（广野荣次郎、金岛治三郎著）也于1940年9月上禁书目录。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战败之前，韩国语入门书一直是他们的检查对象。参见《日政下的禁书33卷》（《新东亚》1977年1月号副刊附录）（东亚日报社，1977年），第265页，第276页。

19 周作人，《外国语》（1944.9.16），载《周作人散文全集（9）》（钟叔河编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4-235页，“我的杂学如上边所记，大部分是从外国得来的，以英文与日文为媒介……。”“此外外国语，还曾学过古希腊文与世界语。”

20 周作人，《外国语》（1944.9.16），载《周作人散文全集（9）》（钟叔河编订），第235页。

21 周作人，《外国语》（1944.9.16），载《周作人散文全集（9）》（钟叔河编订），第234-235页。“世界语是我自修得来的，原是一册用英文讲解的书，我在暑假中卧读消遣，一连两年没有读完，均归无用，至第三年乃决心把这五十课一气学习完毕，以后借了字典的帮助渐渐的看着起来。”

22 《周作人日记（中）》，第188页。

就在周作人购买《韩语通》《传说的朝鲜》这两本书的前一年，即1919年他先后两次乘船访问日本，途中经由“朝鲜”，使他看到了真实的“朝鲜”。1919年4月他从绍兴出发访问日本，当他接到中国爆发5·4运动的消息后，便匆忙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回程船只。²⁴他在1919年5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入朝鲜境。”²⁵看来，这是他首次体验到“朝鲜”这个空间实体。同年7月他再次访问日本去参观九州“日向”的“新村”，在往返途中又经由朝鲜。据他日记记载，从天津塘沽港出发经由朝鲜到日本，他说，7月4日“下午雾四时半停泊朝鲜冲夜半发。”²⁶在参观了“日向”之后便踏上了归国路程，8月6日下午3点从长崎出发，8月7日“上午过朝鲜境。”²⁷周作人参观日本“新村”回来以后，于1919年10月，在《新潮》杂志上发表的“访日本新村记”中比较具体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七月）四日大雾，在朝鲜海面停了一天，因此六日早上才到门司（Moji），便乘火车往吉松（Yoshimatsu）。”²⁸周作人于1919年两次坐船访问日本的时候都经由朝鲜，亲身体验到“朝鲜”这个空间实体。在这之前对周作人来说，朝鲜只不过是未曾意识到的模糊的邻国，这时他亲眼确认了朝鲜这个实体。周作人两次体验“朝鲜”后，1920年开始购买有关韩国语和韩国文化书籍。可见，两次体验“朝鲜”很显然成为他认识和了解这个国度、这个民族的重要契机。

“朝鲜”体验之所以成为周作人对韩国产生兴趣的契机，恐怕是因为在他访问日本时，特别是参观到“日向”的“新村”，又与以武者小路实笃为首的日本白桦派知识分子进行了交流，在这一过程中，对他们的理念和理想产生了共鸣的缘故。所谓“新村”就是在白桦派领导人武者小路实笃的倡导下，于1918年11

23 笔者论文《近代时期韩国的周作人批评和人际交流》，载《中国语文学志》第62辑（2018.3），第185-186页。

24 周作人，《〈小河〉与“新村”（下）》，载《周作人散文全集（13）》（钟叔河编订），第569页。

25 《周作人日记（中）》，第26页。

26 《周作人日记（中）》，第36页。

27 《周作人日记（中）》，第42页。

28 周作人，《访日本新村记》（《新潮》1919.10.30），载《周作人散文全集（2）》（钟叔河编订），第174页。

月14日在日本九州向日向建设的一个理想村。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日本的新村》一文里，介绍新村运动时说：“新村运动是世界上一件很可注意的事”，是“值得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的运动之一”。他还强调说：“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真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²⁹他还在《访日本新村记》中感慨地叙述了访问“新村”的感想：“我们常感着同胞之爱，却多未感到同类之爱；这同类之爱的理论，在我虽也常常想到，至于经验，却是初次。新村的空气中，便只充满这爱，所以令人融醉，几于忘返，这真可谓不奇的奇迹了。”³⁰访问“新村”后，周作人被武者小路实笃以人类之爱为基础，建设理想村的人类主义理念深深打动，归国后主张在中国也要宣传和实现建设新村的理想。³¹当他超越“同胞之爱”被“同类之爱”，即被人类之爱的理念所陶醉并在这时经由朝鲜境内，亲身体验了“朝鲜”的存在，这使他顿然醒悟：朝鲜俨然存在！他认识到，应以人类之爱对待朝鲜。他后来还说：“新村的理想现在看来是难以实现，可是那时创始者的热心毅力是相当可以佩服的，而且那种期待革命而又怀忧虑的心情于此得到多少的安慰，所以对于新村的理论在过去时期我也曾加以宣扬，这就正是做那首“小河”诗的时代。”³²由此可见，他虽然没有把“新村”理念和理想坚持到底，但不难看出在那特定时代他还是深有感悟并在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周作人访问“新村”时正是韩国刚刚爆发3·1独立运动之后。正如在北京

29 周作人，《日本的新村》（《新青年》1919.3），载《周作人散文全集（2）》（钟叔河编订），第134页。

30 周作人，《访日本新村记》（《新潮》1919.10.30），载《周作人散文全集（2）》（钟叔河编订），第176页。

31 周作人1920年3月1日在《新青年》上发布了一则启事，题为“新村北京支部启事”，内容如下：“本支部已于本年二月成立，由周作人君主持一切，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况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支部地址及面会日期如下：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宅，每星期五及星期日下午一时至五时。”周作人，“新村北京支部启事”，载《周作人散文全集（2）》（钟叔河编订），第228页。

32 周作人，《〈小河〉与‘新村’（下）》，载《周作人散文全集（13）》（钟叔河编订），第571页。

大学学生的启蒙杂志《新潮》1919年4月号中刊载的傅斯年（孟真）的《朝鲜独立运动之新教训》及陈兆畴（穗庭）的《朝鲜独立运动感言》等文章所证明的那样，韩国3·1独立运动大大地影响了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傅斯年在《朝鲜独立运动之新教训》中写道：“这次朝鲜的独立，就外表论来，力量是很薄弱的，成功是丝毫没有的，时间是很短的，但是就内里的精神看起来，实在可以算得‘开革命界之新纪元’。”³³表示对韩国独立运动的肯定与大力的支持。《新潮》创刊于1919年1月，由当时的北京大学在校生傅斯年和罗家伦担任编辑，不久因他们出国留学而改由周作人担任主任，他非常重视学生们的文章。

周作人曾经说过，在创作《小河》（《新青年》1919.2.15）时，他体验、目睹了日本理想村建设现场，这使他能够超越“同胞之爱”感受到“同类之爱”，即人类之爱，因而能够摆脱“期待革命却又忧虑的心情”。可以说，《小河》³⁴隐喻地表达了当时周作人的理念和向往。《小河》里的河坝阻碍河水的流向，而导致小河上游干涸，下游腐烂，这象征着农夫（人）的人为的行为，而那无法流淌而在原地打转的河水则象征着被人压抑的生命力。有些人说这首诗表现了陷入困境而左右为难的周作人本人的心境。而更多的人则认为，这首诗用隐喻手法强调了周作人对生命自由流淌的理念和向往。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恐怕更符合实际。如果说，周作人的《小河》以诗的形式形象地描绘了拒绝生命自由流淌的一切的压制行为，那么，“农夫”是用来比喻日本帝国主义的，农夫用泥土，乃至用石块修筑河坝的行为比喻日本人“支配朝鲜”的行为，说明它在压制朝鲜人生命之自然流动。在周作人刚刚发表《小河》之际，爆发了力争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呐喊彻底独立的3·1独立运动。在他眼里这是巨大的抗争力所爆发出的朝鲜人生命的自然流动，无疑是一个重大事件。

33 傅斯年，《朝鲜独立运动之新教训》，载《新潮》第1卷第4号（1919.4.1）（影印本），第687页。

34 参见周作人，《小河》，载《谈龙集》，《周作人全集（一）》（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123-126页。

总之，周作人对1919年前后以世界语为媒介表现的世界主义及白桦派“新村运动”的理念产生共鸣，进而向往人类主义。在韩国3·1独立运动的冲击下，并将韩国作为一个空间实体，亲身体验之后，他为了更好地了解韩国人的精神世界而试图学习韩国语，还以实际行动同韩国人频繁进行交流，同时购买了不少有关韩国文化的书籍。

3. 译文《朝鲜传说》与柳宗悦的《朝鲜与其艺术》

周作人在《乡土研究与民艺》一文中说，日本民俗学的创始人柳田国男的乡土研究对他影响很大。他还谈到日本民俗艺术运动主导者柳宗悦对他的影响。他说，非常有趣地读过柳宗悦的《宗教与其本质》，并说：“柳氏又著有《朝鲜与其艺术（朝鮮とその藝術）》一书，其后有集名曰《信与美（信と美）》，则辑关于宗教与艺术的论文之合集也。民艺运动约开始于二十年前，在《什器之美》论集与柳氏著《工艺之道（工藝の道）》中意思说得最明白，大概与摩理斯的拉飞耳前派主张相似，求美于日常用具，集团的工艺之中，其虔敬的态度前后一致，信与美一语洵足以包括柳氏学问与事业之全貌矣。”³⁵他还补充说，在他的书斋里收藏有《民艺丛书》之一柳宗悦的《初期大津绘》和浅川巧所出版的《朝鲜之食案（朝鮮の膳）》，还有《朝鲜陶器名汇》等书籍。周作人积极阅读柳宗悦的著作并支持柳氏的“民艺运动”。特别是《朝鲜与其艺术》一书对周作人的影响很大，帮助他提高了对朝鲜文化之地位与艺术价值的认识。他在《朝鲜民间故事》的序文中说：“关于朝鲜的艺术，我的知识只有李朝磁器的一点，还是从柳宗悦氏的书里间接得来的，而且磁器又是很不好懂的一样东西。”³⁶可见对周作人的影响之大。

大家都知道，柳宗悦关注的是当时鲜为人知的朝鲜佛像和陶瓷等，试图从中寻找出朝鲜固有的美，并首次揭示了朝鲜艺术的独立性，赞美其优秀。他认为艺

35 周作人，《乡土研究与民艺》（1944.8.1），载《周作人散文全集（9）》（钟叔河编订），第222页。

36 周作人，《序》，《朝鲜民间传说》（上海女子书店，1933年第二版），第3页。

术的分类应该以民族为单位，朝鲜民族就是一个基本单位，体现着独立的、固有的艺术精神。他还揭示这一艺术的特色在于它的“线条”和“白色”，并把它定为美学上的“悲哀美”。他的重要贡献就在于把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朝鲜民族解释为具有独立艺术精神的实体。柳宗悦在《朝鲜与其艺术》一书中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在东方文化中朝鲜将会因其艺术获得卓越的地位。”³⁷ 还说，“日本当作自己的国宝向世界夸耀，而世人也确认其美的大部分作品到底是经过谁的手而制作出来的呢？其中被认为是国宝中的国宝的几乎全部作品实际上是不是都由朝鲜民族制作出的？其次就是中国的，这是不言而喻的，是经过历史学家们考证过的，是事实，不会错。与其说是日本的国宝还不如说是朝鲜的国宝。”³⁸ 他还说，“我认为，就陶瓷而言，朝鲜是独立的朝鲜。”³⁹ 接着说道：“我最后澄清这一事实，以便向世界为朝鲜艺术提供辩护。”⁴⁰ 他特别强调这一点。⁴¹

周作人积极接受柳宗悦的主张，认为朝鲜艺术具有自身的固有性和独立性，试图在自己所关心的民间文学领域中也论证这一点。他在1925年5月25日发表在《语丝》上的《朝鲜传说》就是一个例子。他在文章开头部分简单做了一些说明，接着就安排了《崔致远》、《斗法》、《掉文》等译文。下面先来看他的解说部分。

这三篇故事是从日本三轮环译述的《传说之朝鲜》(Densetsu no Chosen, 1919) 中选译出来的。无论朝鲜是否箕子之后，也不管他以前是藩属不藩属，就他的地位历史讲来，介在中日之间传递两国的文化，是研究东亚文明的人

37 柳宗悦著，Lee Giljin 译《朝鲜与其艺术》(SinKoo, 1994年)，第82页；柳宗悦，《朝鮮とその藝術》(春秋社，1954年)，第103页。

38 柳宗悦著，Lee Giljin 译《朝鲜与其艺术》，第82页；柳宗悦，《朝鮮とその藝術》，第104-105页。

39 柳宗悦著，Lee Giljin 译《朝鲜与其艺术》，第155页；柳宗悦，《朝鮮とその藝術》，第222-223页。

40 柳宗悦著，Lee Giljin 译《朝鲜与其艺术》，第161页；柳宗悦，《朝鮮とその藝術》，第233页。

41 周作人1950年9月19日在《亦报》上发表了“朝鲜的雕刻”一文，提到了庆州吐含山石窟庵的佛像，还说，“柳氏说或说朝鲜美术在种类与量上甚为鲜少，却不知这量的鲜少的原因，实为好破坏的倭寇之罪，事实具在无可抵赖。柳氏为日本人，而能承认丰臣秀吉等为倭寇的行为……”周作人，《朝鲜的雕刻》，《周作人散文全集（10）》（钟叔河编订），第497页。

所不应忽视的。我们知道日本学于本国文化研究上可以供给不少帮助，同时也应知道朝鲜所能给与的未必会少于日本。这几篇虽只是民间传说，又是出于重译，不能说有多大的价值，但在中国人读了，当能感到一种特别的，既非日本又不全是中国的趣味。我想在这里带便表明对于朝鲜艺术的敬意，希望有人介绍那些优美的雕刻绘画给中国人看。⁴²

周作人选译的底本是三轮环的《传说的朝鲜（傳説の朝鮮）》，这本书是1919年9月16日东京博文馆出版的版本，第一篇山川共34话，第二篇人物共38话，第三篇动植物及杂共42话，第四篇童话共25话，所收录的韩国传说总共139篇。当时日本有代表性的综合月刊《太阳》1919年11月3日号刊登过《新刊介绍》，其中有这本书的介绍，其中写道：“朝鲜文化非常悠久。日本的古代到中世纪的文化大多依赖于朝鲜。悠久的朝鲜文化至今仍可从很多方面找到其痕迹，只不过没有以‘物像的’形态保存下来，更多更丰富地残留于民间遗留下来的习俗中或民间口头传说中。在这一点上，该书可称为研究朝鲜文化史的宝贵成果之一。”⁴³周作人在翻译介绍该书中的三篇故事时，摆脱了中国人对朝鲜的“箕子朝鲜”或“潘属国”等旧观念和传统认识，高度评价朝鲜在东亚文明中所占据的文化地位，并从比较学的角度向中国文化界提出了研究朝鲜学的必要性，说这不比研究日本学次要。虽然周作人本人也承认只用这三篇朝鲜传说无法充分证明朝鲜的文化地位，但他抱着这种意识翻译介绍朝鲜故事，实属非同一般。

周作人翻译介绍“朝鲜传说”与当时他作为北京大学的教授所进行的学术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1920年12月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研究会，由周作人担任主任，于1922年12月创刊了《歌谣周刊》，由此掀起了收集研究中国各地歌谣的热潮。1923年1月歌谣研究会决定扩大收集范围，开始收集除了歌谣以外的神话、

42 开明（周作人），《朝鲜传说》，载《语丝》第28期（1925.5.25），第1页。

43 转引 Lee Sijun, Kim Gwangsik, 《三轮环和朝鲜传说集《传说的朝鲜》考》，载《日本言语文化》第22辑（2012），第616页。

传说、童话故事、风俗、方言等方面的材料。周作人也把研究转向民俗学，开始研究歌谣、神话、传说、童话故事、民间风俗等，⁴⁴就在这个时候他注意到朝鲜的民间故事，便着手翻译了“朝鲜传说”。⁴⁵他在北京大学开设“欧洲文学”讲座时，非常重视比较学的研究方法，所以“朝鲜传说”就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比较学的参考材料。上述引文中出现的“当能感到一种特别的，既非日本又不全是中国的趣味”一句，可以联想到柳宗悦在《朝鲜与其艺术（朝鮮とその藝術）》中所说的一句话，他在《李朝陶磁器的特质》一文中说，“大部分用朴素大方的笔墨画出了一朵花或一只鸟等简单的对象。而它决不是中国的，也不是日本的。”⁴⁶可知，周作人借用柳宗悦有关朝鲜艺术的言论向中国人介绍了“既非日本又不全是中国的”，只有朝鲜才有的那种“特殊的趣味”，他是讲到了“朝鲜传说”，试图以此来论证朝鲜文化的独立性，进而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提供比较学的参考材料。可惜的是由于韩国语学习的中断，他只能以日译本《传说的朝鲜》为底本，将其重新翻译成中文“朝鲜传说”。

那么，周作人为何在《传说的朝鲜（傳説の朝鮮）》人物篇中选择《崔致远》、《斗法》（「術競べ」），在童话篇中选择《掉文》（「漢語遣ひ」）进行翻译了呢？其原因是什么呢？分析故事内容就可猜到一二。

《崔致远》讲的是，韩国新罗时期中国送来了一个装有鸡蛋的玉箱，要求新罗猜出箱里的东西是什么。崔致远猜出里面装的原是鸡蛋，但都孵化成了小鸡，而今却都已经死了。他就用汉诗写出其内容同玉箱一起送回了中国。故事说明新罗也有聪明人不仅能猜出玉箱中装的是什么，而且还能推断出鸡蛋孵化成小鸡之

44 周作人的这些学术活动当时也介绍了韩国。丁来东 1931 年在《东亚日报》上介绍杨荫深著述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说》（上海华通书局，1930. 1. 25）时简单介绍了周作人研究民间文学的活动。“周作人在 3~4 年前主导搜集歌谣的活动，收集了 3~4 集歌谣，还发刊《歌谣论文集》，近来对《民间故事》也相当有研究，中国以外的学者已经从唐诗、元曲或古代诗歌的研究转为研究明清以后的民间文学。”（丁来东，《中国民间文学概说》，载《东亚日报》1931. 12. 27）。

45 《语丝》第 28 期刊载了《朝鲜传说》，同时还刊载了刘半农（刘复）的一篇文章《国外民歌译》（当时他已翻译两首法国民歌）以及颜黎明写给周作人（开明）的一篇信件形式的文章《杜鹃的故事》。

46 柳宗悦著，Lee Giljin 译，《朝鲜与其艺术》，第 160 页；柳宗悦，《朝鮮とその藝術》，第 230 页。

后又都死掉的事实。这个故事暗示中国打探、测试朝鲜人的智力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斗法》讲的是，壬辰倭乱时期曾经立下赫赫功勋的金刚山西山大师和妙香山四明堂首次相逢的时候较量“道术”，结果四明堂败给比他强的西山大师后，跪地拜他为师的故事。故事暗示朝鲜也有高人。《掉文》讲的是，某山村有一位农夫为自己的独生女招了一个女婿，可这个女婿乱用汉语（汉文）逞能。有一天，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一只老虎叼走了他的丈人。女婿急忙用汉语告知乡亲们，可乡亲们根本听不懂他说什么，结果谁都没能去救他的丈人。郡守大怒，治他的罪并罚他挨板子。可那女婿仍又用汉语说道：“实用汉语愿容恕而已”，“今后决不用汉语”。故事诙谐地道出乱用汉语会遭难的道理，暗示汉语不能成为朝鲜普通老百姓的交际工具，巧妙地揭示着朝鲜社会文化的独立性。周作人在第三个故事后边加了“附记”说：“看这个掉文的女婿，令人想起《镜花缘》里白民国的酒保与老者来，虽各有佳处，似乎女婿稍近自然，异于老白民之以 grotesque 取胜。”⁴⁷肯定了《掉文》在人物形象方面好过清代章回小说《镜花缘》的一面。这三篇故事都明显地表现出朝鲜文化的自我认同，周作人选择这些故事的原因就在这里。《传说的朝鲜》与几乎同一时期出版的高桥亨的《朝鲜故事集与谚语（朝鲜の物語集附俚諺）》（1910年）等书不同，排除了对朝鲜人的偏见，所以受到了高度评价。⁴⁸周作人似乎也在不知不觉中识破了这一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朝鲜时期朝鲜总督府发行的《朝鲜人》一书赤裸裸地记述着对朝鲜人的偏见。比如，为了“合理”解释日本人的统治，说，“朝鲜人的代表性习性‘思想上的固执性’和‘思想的从属性’，今后也不会改变。”还说，“朝鲜人的形式主义、审美观念的缺乏、软弱性、朋党性以及公私不分等习性和态度，将在通过学习近代学问，接受日本人统治的条件下逐步得到改造。”⁴⁹而周作人对朝鲜或对朝鲜文化的认识却是建立在与此全然不同的思想基础之上。

47 开明（周作人），《朝鲜传说》，载《语丝》第28期（1925.5.25），第2页。

48 参见 Lee Sijun, Kim Gwangsik, 《三轮环和朝鲜传说集〈传说的朝鲜〉考》，载《日本言语文化》第22辑（2012），第618页。

49 参见高桥亨著，Ku Inmo译，《论殖民地的朝鲜人》（东国大学出版社，2010年）。

在此，有必要重温柳宗悦将朝鲜的美说成“悲哀美”的观点。柳宗悦之所以把朝鲜艺术的固有性定在“线条”与“白色”以及“悲哀美”上，是因为作为殖民者的一员，他用悲伤和同情的眼光看待朝鲜的心理机制起了作用。还有一点，因为他所议论的重点局限在朝鲜佛像或陶瓷及生活杂器等“民间艺术”方面，而不是以整体朝鲜艺术为对象。周作人通过《朝鲜与其艺术》表示对朝鲜艺术的独立性及其价值的共识，而不是原封不动地接受柳宗悦将朝鲜艺术的特质归结为“悲哀美”的美学观点。柳宗悦说：“惨淡、痛苦的朝鲜历史在其艺术上刻下了无人知晓的孤独和悲哀。在那里始终留有悲哀之美，含泪的孤独。我在观察它的时候则无法控制心头涌动的情感。这种充满悲哀的美，到哪里再去寻找呢？”⁵⁰就这样，他用孤独和悲哀的目光观察朝鲜艺术。但周作人则对朝鲜艺术表示“敬意”，并没有用“充满悲哀的美”来介绍它。

总而言之，周作人从19世纪20年代中叶开始将自己的研究扩大到民俗学领域，研究歌谣、神话和传说以及民间故事等。他通过柳宗悦的《朝鲜与其艺术》悟出了朝鲜文化的地位和艺术的价值，选择《传说的朝鲜》中的三篇故事翻译介绍了“朝鲜传说”。他为中国介绍一种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日本的，而具有朝鲜特殊“趣味”的“朝鲜传说”，为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比较学的参考材料，同时让中国人摆脱传统观念或偏见，来正确了解朝鲜，真正认识朝鲜文化的独立性。“朝鲜传说”是周作人正确了解和论证韩国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之一。

4. 中、日、韩东亚三国的文化关系

周作人在1945年9月发表的《过去的工作》一文中说，过去40年所写的书，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20年他喜欢文学，主要翻译了弱小民族及被压迫的国家，如匈牙利、波兰、俄罗斯等国家的作品。后来重视文化和思想领域，而首先关注希腊，接着是日本，然后关注起中国的文化和思想。⁵¹可以说，他把关注的视线

50 柳宗悦著，Lee Giljin译，《朝鲜与其艺术》，第41页；柳宗悦，《朝鲜とその藝術》，第36页。

转到文化和思想领域的时期大体是他开始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大到民俗方面的1924年、1925年左右，正好与他读柳宗悦的《朝鲜与其艺术》，翻介“朝鲜传说”的时期相重合。

周作人把他的学术研究重点转移到文化和思想领域之后，不仅关心朝鲜的文化，也关心朝鲜的独立运动。1926年2月13日日本《读卖新闻》刊登了李完用死亡的消息，紧接着15日在同一报纸上又登出烈士朴烈接受法庭判决的消息。他读了这两条消息后，于2月26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李完用与朴烈》的文章。文章首先将《读卖新闻》上“日韩合并之功臣李完用侯逝世”的题目和“宫中得到李侯病笃的消息，下赐蒲桃酒一打以当慰问。”的内容原封不动地翻译出来，又将“第三年初在法庭相见的朴烈夫妇”的题目和关于朴烈被判死刑的消息也原原本本地加以翻译。然后，周作人以与《读卖新闻》这两篇文章截然不同的观点评论了李完用和朴烈。他在文中说，李完用才是“叛徒”，而朴烈是真正的“烈士”。还说，“朝鲜在日韩合并的时候固然出了不少的叛徒，但是安重根、朴烈，以及独立时地震时被虐杀的数百鲜人，流的报偿的血也已不少了。我对于这亡国的朝鲜不能不表示敬意。”⁵² 他还说：“朝鲜的民族，请你领受我微弱的个人的敬意，虽然这于你没有什么用处。我以前只知道你们庆州一带的石佛以及李朝的磁器，知道你的先民富有艺术的天分，现在更知道并世的朝鲜人里也还存在血性与勇气。”⁵³ 周作人不仅知道朝鲜艺术的优秀性，还理解其文化的独立性。这次又被烈士朴烈所表现的“血气和勇气”所感动而提起了笔。因此，他对日本吞并朝鲜的行为表示愤慨并用激昂的语调吐露：“不禁感到一种悲愤。”⁵⁴ 因为他认为具有

51 参见周作人，《过去的工作》（1945.9.30），载《周作人散文全集（9）》钟叔河编订，第622页。“前二十年喜欢讲文学，多翻译弱小民族及被压迫的国家的作品，以匈牙利、波兰及俄国为主，但是后来渐渐觉得自己不大懂得文学，所以这方面的贩卖店也关了门了。这以后对于文化与思想问题稍为注意，虽然本来还是从文学转过来的。（略）我所注意，所想要明白的事情只是关于这几过的，即一是希腊，二是日本，其三最后却最重要的是本国中国。”

52 周作人，《李完用与朴烈》，载《周作人散文全集（4）》（钟叔河编订），第489页。

53 周作人，《李完用与朴烈》，载《周作人散文全集（4）》（钟叔河编订），第489页。

54 周作人，《李完用与朴烈》，载《周作人散文全集（4）》（钟叔河编订），第489页。

固有文化认同的民族应实现民族独立。他说：

朝鲜我也希望他能独立，不属于中日，自然也不要属于苏联。朝鲜的文化虽然多半是中国的，却也别有意义，他是中日文化的连络，他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也是日本文化的启发者。在日本直接与中国交际之前，朝鲜是日本唯一的导师，举凡文字，宗教，工业，文物各方面无不给与极大助力，就是近代德川朝的陶磁工艺也还是由于朝鲜工人的创始。⁵⁵

我们在前面已经了解到周作人通过柳宗悦的《朝鲜与其艺术》一书了解了朝鲜的艺术和文化。柳宗悦受到3·1独立运动的冲击在《读卖新闻》（1919.5.20～24）上发表的《思考朝鲜人（朝鮮人を想ふ）》一文也收录在《朝鲜与其艺术》里。在这里他说：“如前所述，我虽然是对朝鲜没有任何学识的人，然而自己却有幸在欣赏艺术中发现了朝鲜人所发出的心中的要求，而认为自己是对朝鲜抱有充分情感的人之一。我常常想，某国家的人了解另一个国家的最好的途径并不是科学或政治方面的知识，而是了解其宗教或艺术内在的东西。”⁵⁶柳宗悦曾说，当他认识到朝鲜文化艺术的价值之后，对朝鲜充满了感情。周作人也是随着柳宗悦的认识逻辑先是对朝鲜的文化艺术产生共鸣，然后进一步联想到朝鲜民族的国家独立。

当通过文化和艺术确认不同民族固有的同一性并以此为基础去想象各民族的国家独立的时候，中、日、韩东亚三国的文化关系自然成为周作人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周作人在1931年10月发表的《朝鲜民间故事·序》⁵⁷中明确说明了这一点。他在这篇文章中重新引用自己在六年前发表的《朝鲜传说》一文中已经阐述过的看法，强调指出必须重视在中日两国之间起到文化传递者作用的朝鲜

55 周作人，《李完用与朴烈》，载《周作人散文全集（4）》（钟叔河编订），第490页。

56 柳宗悦著，Lee Giljin译，《朝鲜与其艺术》，第19-20页；柳宗悦，《朝鮮とその藝術》，第1-2页。

57 《朝鲜民间故事》（Contes Coréens）本来是法文版，由当时法国留学的刘半农在巴黎购买后让其女儿刘小蕙翻译，然后由他校阅后出版。

的历史地位，从东亚文明研究角度，也万不可忽视朝鲜学。他说：

我理论地推重朝鲜艺术与其研究的价值，毫不改变从前的意见。这种意见我知道难免有点失之迂阔，有点近于‘大亚细亚主义’，或者又不合现今实际。但是这有什么办法呢，两者都是事实，只好都承认罢了。中日韩的文化关系是久矣夫的事情了，中日韩的外交纠葛却也并不很近。（略）在人智未进的现在，两账只能分算，虽然这样办已经不是很容易的事。在平壤仁川沈阳锦州大暴动之后，来检点日韩的艺术文化，加以了解与赏识，这在热血的青年们恐怕有点难能亦未可知，但是我想这是我们所应当努力的。⁵⁸

周作人说过他在理论上高度评价朝鲜艺术及其研究，像是要用事实证明这一点似的，他在发表《朝鲜传说》之后购买了浅川巧的《朝鲜的饮食（朝鲜の膳）》；在写了《朝鲜民间故事·序》之后，购买了《李朝白磁》、《李朝铁砂》、《朝鲜民谣选》、《朝鲜童谣选》等书籍。那么，他一方面主张“应该重新认识日韩的艺术文化”，一方面又指出，如不小心这一主张可能会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亚洲并为此所提出的“大亚细亚主义”提供帮助。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其背景是什么呢？

周作人的该序文写于“万宝山事件”和“9·18 满洲事变”发生不久以后。万宝山事件发生于1931年7月2日。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占领满洲，在中国吉林省地区蓄意策划的朝鲜人农民和中国人农民之间的流血冲突。在冲突中日本警察向中国农民进行了疯狂射击，造成严重后果。同一时期，在朝鲜境内也发生了暴乱。由于各家报纸刺激朝鲜民族的单纯民族感情，煽动他们掀起了一种运动，以攻击居住在朝鲜境内的中国人，于是在仁川、首尔、元山、平壤等地相继发生了排斥中国人的事件，在平壤甚至出现了大白天砸中国人商店和住宅，殴打和屠

58 周作人，《序》，载《朝鲜民间传说》（上海女子书店，1933年第二版），第3-5页。

杀中国人的严重事件。日帝又在同年9月18日发动满洲事变占领了整个满洲。就在朝鲜人被日本怂恿发动暴乱、日本占领满洲这一系列政治事件发生之后，要求中国人重新认识日本和韩国的艺术文化，就很可能成为参与日本侵略策动的行为。周作人在《朝鲜民间故事·序》中将中日两国政治关系中的日本比喻为杀死自己师夷羿的“逢蒙”或毁掉面包店的“暴发户弟子”。正当因万宝山事件和满洲事变中国人对韩国和日本的敌对情绪极为激昂的时候，主张重新认识日韩的文化艺术并把它视为珍宝，极有可能酿成“不合现今实际”的大错误。但周作人却认为，表面上表现出来的政治关系背后俨然隐藏着中日韩三国之间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关系，而对这一关系的探讨将会成为解决被歪曲的现实政治问题的重要途径。周作人重复强调“两者都是事实，只好都承认罢了。”“两账只能分算”的观点，就是因为他认为应该从现实的政治关系中退出一小步，去探讨“东亚”文化关系的根源。总之，周作人主张中日韩东亚三国的文化关系应该与现实的政治关系分开来，作为学术研究另行探索。因为这种探索才会确保未来重建中日韩东亚政治关系所必须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正当性。

综上所述，周作人高度评价韩国艺术和文化的价值，强调其独立性，重视其历史地位，并主张从中日韩三者在内的东亚文明角度出发，首先应去探讨他们之间的文化关系。他联想到的是，在此基础上，东亚的中日韩三国应该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文化关系上，建立能够实现东亚各民族国家独立的新的政治关系。

5. “思想”的局限与宣传“大东亚主义”

如前所述，1919年前后周作人对日本“新村运动”及以武者小路实笃为代表的日本“白桦派”知识分子的理念产生共鸣而向往人类主义或世界主义，加上韩国3·1独立运动的冲击和对韩国空间实体的亲身体验，使他开始学习韩国语并购买有关韩国文化的书籍。尤其是1924年、1925年左右，他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从文学转向文化思想之后，加快了对歌谣、神话和传说、民间故事、风俗的研究步伐。柳宗悦的《朝鲜与其艺术》为周作人了解韩国的文化和艺术提供了非常

重要的资料。周作人高度评价韩国的文化地位和艺术价值，为了论证韩国的文化自我认同，他翻译了“朝鲜传说”，认为朝鲜民族具有固有的文化自我认同，他大力支持朝鲜民族实现国家独立，并从比较学角度提出中国的文化研究有必要研究“朝鲜学”。他认为，应该避开当前的政治关系，从东亚文明角度出发，先来探索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中日韩东亚三国的文化关系。他还构想在此基础上建立能够实现东亚各民族国家独立的新的政治关系。

但是，周作人对韩国文化的认识和他的东亚文明意识仅止于宣言性的理念，缺乏具体性和实践性，这在他后来的行动中得到了证实。1931年他撰写《朝鲜民族故事·序》之后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再也没有发表任何有关韩国文化的文章。当然，韩国语的学习未能成功是个客观原因，这使他的研究难以继续深入。更重要的原因是“万宝山事件”“满洲事变”以后，在中国境内对研究日本文化之必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淡化了，而对韩国文化的研究也随之失去了号召力。周作人说：“自己惭愧于经济政治等无甚知识”，⁵⁹因而只能专心去关注文化艺术而远离政治经济，结果随着中国国内革命高潮的到来，加上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占中国成为现实之后，他便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严重危机。虽说他的学术研究转向了文化和思想领域，但远离紧迫的现实而研究文化艺术，是无法把真正的“思想”研究深入下去的。周作人暗示过自己主动停止研究日本文化，直接的原因就是日本大肆侵略中国。他说，“文学艺术上得来的意见不能解释日本的事情，特别是历来对华的政治行动，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既有了这些深刻的反证，我自不能不完全抛弃以前关于日本文化的意见，声明无所知，（略）我的徒劳的日本文化研究因此告一段落。”⁶⁰他试图努力摆脱现实政治，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受到日本侵略“政治”的拉拢而陷入了“亲日附逆”的泥坑。

周作人“亲日附逆”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积极宣传日本侵略者为美化侵略亚洲的行为而标榜的“大东亚主义”。实际上，在他发表《李完用和朴烈》一文之后，

59 周作人，《儿童文学》（1944.7.9），《周作人散文全集（9）》（钟叔河编订），第212页。

60 周作人，《过去的工作》（1945.9.30），载《周作人散文全集（9）》（钟叔河编订），第624页。

又于1926年3月16日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排日》的文章。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他已清晰地看出日帝藏在“中日共存”美名之下的企图侵略中国的意图。他说，“中日共存的理论是对的，不过他的前提是先要中国有排日的决心与毅力，没有这个的共存就是合并。”⁶¹他在1927年7月发表的《排日平议》中还强调说：“日本天天大叫‘日支共荣共存’，其实即是侵略的代名词”“我们要明白，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我们要留心，不要信任他，但要努力随时设法破坏他们的工作。这是中国智识阶级，特别是关于日本有多少了解的人，在现今中国所应做的工事，应尽的责任。”⁶²他如此正确地击中了日帝藏在“共存共荣”美名下那一侵略中国的野心，呼吁中国知识分子要警惕。但后来，当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略中国之后，他却鼓吹“共存共荣”，宣扬“大东亚主义”，走上了与中国人民背道而驰的道路。周作人在1940年11月30日发表的《东亚民的前途》一文中公然吹捧“大东亚主义”。他说，“东亚文化的祖源是整个的，东亚民族的命运亦是整个的，这是我个人多年来的信念。（略）我只凭了自己浅近的常识看去，觉得这些民族的死活问题是整个的，在这里没有损人可以利己，你死就是我活的道理。（略）大家须得相互扶助，共寻生路，才是正当的办法。”⁶³他在1944年1月15日发表的《总工之辩》一文中也强调说：“东洋民族的命运是整个的，非互相协和不能寻生路。”⁶⁴

在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周作人的这些论调同鼓吹“大东亚战争”的武者小路实笃的言论惊人地一致。曾在周作人心里播下人类主义或世界主义理念种子的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略中国之后，更加大力鼓吹东亚如果没有日本，根本谈不上中国和韩国能独立存在，这两个国家在东亚只因日本的存在才有获得新生的希望。他还说，“日本的使命是使东亚成为真正的东亚，使东亚

61 周作人，《排日》（1926.3.16），载《周作人散文全集（4）》（钟叔河编订），第532页。

62 周作人，《排日平议》（1927.7.9），载《周作人散文全集（5）》（钟叔河编订），第248-249页。

63 周作人，《东亚民族的前途》（《晨报》北平，1941.11.30）；张菊香，《周作人的一篇佚文》，载《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期，第60页。

64 周作人，《总工之辩》（1944.1.15），《周作人散文全集（9）》（钟叔河编订），第15页。

民族不受英美的蔑视，使人们活着能愈发忠于自己的生命”。⁶⁵武者小路实笃于1937年6月被选为日本帝国艺术院会员，大力宣传并美化“大东亚战争”。他还担任“文学报国会”的“剧文学部”会长，在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第二次大会上以“必胜的信心”为题进行演讲，大肆宣扬“大东亚圣战”。⁶⁶而曾经对武者小路实笃的人类主义或世界主义产生强烈共鸣的周作人，此时也步武者小路实笃的后尘带头宣传“大东亚主义”。

但是柳宗悦，这位曾启发周作人重新认识韩国文化的地位、韩国艺术之优秀性的日本人，与武者小路实笃走的是截然不同的路。柳宗悦于1924年设立了“朝鲜民族美术馆”，之后又于1936年设立了“日本民艺馆”，并将此作为民族艺术运动的基地，深入开展各种现实的文化活动并抵制日本军国主义。他抗拒过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镇压韩国3·1独立运动的暴行，开展并领导过解除日帝的“冲绳方言禁止令”运动。⁶⁷这是日帝面临即将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发起的标准语运动，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入战时状态，所发起的统一国民精神运动的一环。柳宗悦对此提出了异议，实际上是批评日本军国主义所实施的国家控制体制。周作人从柳宗悦和武者小路实笃那里都曾受到过一定的思想影响，但他没有跟随柳宗悦参与现实运动以抗拒日本军国主义，而是追随武者小路实笃走上了鼓吹“大东亚主义”的道路。周作人曾在柳宗悦的影响下积极主动地了解韩国的文化和艺术，并在这一过程中，积极提倡研究东亚文明，然而他却未能把这一研究引向“思想”的深度，结果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主义”引诱和拉拢，走上了为日帝摇旗呐喊、“亲日附逆”的歧途。

周作人因其“思想”的局限性宣传过“大东亚主义”，但他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初期这一期间，在当时东亚文明意识相当薄弱的中国，能够摆脱传统观念和偏见，重视中日韩三国在东亚文明中的相互关系，并积极提倡予以

65 转引武者小路实笃，《日本的使命》；刘立善，《日本白桦派与中国作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67页。

66 参见刘立善，《日本白桦派与中国作家》，第267页。

67 Lee Inbeom, 《朝鲜艺术和柳宗悦》（时空社，1999年），第27页。

研究，这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在今天，这仍然是一个为东亚共存须积极探求的重要课题。

[作者] 洪昔杓：[韩国] 梨花女子大学 中文系 教授，[中国] 延边大学 特聘教授。

[基金项目] [中国]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6ZDA189。

[译者] 崔丽红：[韩国] 东国大学 中文系 教授。